



阅读的春天序曲

■ 丁 帆

每年春节期间都是最好的阅读季节，因为这个时节是最宁静安详的，能够干扰你读书的事情都暂时画上了休止符——一年阅读的交响诗翻开了“春天序曲”。

首先，我得说一下我的同事余斌先生为刚刚仙逝的104岁的杨苡先生口述史撰写的本本《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非常好读的书，尽管有425页，但花上一天你就可以读完，因为这是一本插图版的书籍，关键是它阅读起来轻松“好玩”，一点都不枯燥。余斌用生动而平实的语言再现了一个翻译家百年的生活历史场景。杨先生去世时，有人在网上发文的题目是“中国最后一个贵族小姐的陨落”，但这正与此书口述者和作者的旨趣与初衷相反——他们将人物放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去还原描写，才获得了各个阶层读者的喜爱。非虚构的口述史，就是用这样的观念和方法去俘获广大读者心的，同时站在历史的新高度去体现人类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人性的力量才是跨越阶级和时空的文学叙述。

毫无疑问，余斌在其长长的后记中把他撰写此书的想法讲得透彻了，而我最欣赏的两句句话是：“我想达到的，第一是真实，第二是真实，第三还是真实；而通向这真实，第一是细节，第二是细节，第三还是细节。”所以，甫一拿到此书，我就追寻那些真实的细节，立马翻阅的是，写在后半段的杨苡与我们中文系老师赵瑞麒先生的恋爱史，并无罗曼史，第一次看到了口述者坦坦荡荡地披露历史的真实，看到作者在细节描写上的用

功——平实语言背后的穿透力，把那一场轰轰烈烈的多角恋爱，写得如此风轻云淡，却透出了真实人生的人性表达肌理。穆旦、叶桢、大李先生的行状和“我”的心理描写，以及哥哥杨宪益那段惊世骇俗的话，都是在波澜不惊的叙述中完成的。无疑，这些实录描写之所以能够超越一般性虚构文学的描写，正是当代许多人在看不见真实历史和人生时的解惑，没落家族中那个在灯火阑珊处里最清晰的女性清晰的面影感动了你。

传记文学之所以吸引读者，就是其真实性，当然也有将它演绎成通俗小说者，其销量更加可观，如小时候看唐人的《金陵春梦》津津有味，待长大后，看到其脱离真实，将细节变形、放大、夸张，就感觉到了假的虚伪成了虚构堕落的败笔。于是，余斌的这部非虚构的口述史的全部历史、审美和人性的深度意义就放在了时代的天平上，凸显出了它的重量。还是用《呼啸山庄》里的话来做为杨苡先生的葬词，以及对这部作品的赞词吧：“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燃烧的激情，包括死亡。”“起来！别让自己退化成一条低贱的爬虫。”

是的，理解一篇好的作品，并非就是一次性完成的，再阅读、再还原、再思考、再创造，是阅读一篇经典作品的历史过程，正如我正在浏览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埃德加·劳伦斯·多克特罗一本《创造灵魂的人》随笔集里，作者在重新阅读美国爵士时代大师菲茨杰拉德《崩溃》时所感：“菲茨杰拉德告诉我们：‘他的神经反射已经垮掉了——有太多的愤怒和泪水。’他在描述什么状态呢？一个精神病

患者的插曲？是沮丧？还是精神危机？”这仅仅是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可以解析的吗？显然，不同的读者可以从中学出不同的味道来，正如我们重新阅读菲茨杰拉德描写100年前美国“迷惘的一代”那个经典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一样，反观今日世界，也许我们获得的“迷惘”比菲茨杰拉德更痛苦和悲伤，这就是重新阅读的辐射力量。

其实，我这段时期正在对读许多的绘画理论著作与画作，把美学艺术理论家约翰·萨利斯的《风景的意义》与克拉克的五部艺术史文集，以及那一套“牛津艺术史”绘画理论丛书进行比较研究，试图从中找到新的观看西方绘画史里的“通感”艺术效应，即，它们与文学和音乐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尤其是和中国的当代文学之间因观念美学的差异性，所形成的对风景画、肖像画、风俗画、风情画的不同描写形态。而萨利斯在《风景的意义》中，对风景的界限、密度、悲剧、共振和隐匿的阐释，让我进入了一个更加开阔的广义风景境界，将它们与大量的西方艺术绘画作品进行对读，获得了超越英国艺术史教授贡布里希那本畅销了70年的读本《艺术的故事》的经验，不再停留在历史艺术故事的层次，终于明白了

克拉克在观看油画的时候，为什么总是将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作为观赏绘画的切口，同时也理解了他为什么总是把油画和交响乐的旋律纠缠在一起的原因了。艺术的“通感”让技术层面的表现力熔铸在人文意识的充分表达之中，这才是文学艺术的最高创作宗旨。正是这样的缘故，在这个阅读的“春天序曲”里，我翻看老电影，偶然看到一部《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这不是那幅荷兰风俗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著名的油画吗？以前我只知道他的风景画《小街》归入了荷兰风景画派，但并不出名，而他的这幅肖像画却久久地留在了我的脑畔底片中了，因为这幅肖像画当年只卖了一美元。这位一生穷困潦倒的画家只活了43岁，与梵高绘画命运相似，他的风俗画直到200年以后才被重新发现其伟大的艺术价值，被称为“沉睡了两个世纪的司芬克斯”，可见阅读的历史是一个漫长过程的真谛所在。

而我却并不知道美国作家特蕾西·雪佛兰用此题材写过虚构的长篇小说，而且是一部充满着哀怨的朦胧爱情故事叙事，电影基本上是忠于原著的。这让我想起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区别，作家雪佛兰虚构满足的是哪一个层级读者的需求呢？书籍在西方获得了众多读者，在中国却不不出名，且电影的评分也极低，为什么？

同样，我在充满着好奇心之余，观看了电影《香奈儿的秘密情史》，终于明白了什么是文学艺术的诗性，我便在微信小群里写下了这段文字：在香奈儿的香水里渗透了伊戈尔（原型人物为美籍俄国作曲家、指挥家和钢琴家伊戈尔·菲德洛维奇·斯特拉文斯基）音乐旋律“通感”，与人物故事及画面的互为渗透，互为因果，成为作品跃上谱写人性旋律的巅峰，超越了一般小说描写单调的平面设计，这才是它由艺术灵感进入人物与故事灵魂深处的灿烂光芒。

从虚构和非虚构的情节中来回穿

读《企鹅欧洲史》

■ 汪涌豪

这个春节，终于把封控中开始读的七卷本《企鹅欧洲史》（原书九卷，尚有两卷待出，中信出版集团出版）读完了。其间，还曾将此前翻看过的赫斯特《极权欧洲史》、邓恩《现代欧洲史》、朱特《战后欧洲史》和基佐的《欧洲文明史》拿出来对看。它们构成了个人这个新年的阅读书单。

这部《企鹅欧洲史》由特洛伊和奥古斯丁所代表的古典欧洲切入，经中世纪王权教权缠斗中的人口翻番、城镇崛起，到饥荒、瘟疫造成的基督教世界的瓦解，再及启蒙与理性洗礼下现代欧洲的成形，对塑造这块大陆的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作了清晰的叙述与评价。最后总结拿破仑战争后欧洲之所以从文明之巅峰入大战深渊的历史教训，勾勒出了彼人所生活的世界是如何带着自身的烙印艰难前行的脉络与轨迹，从而为人认识文明发展的“复数形式”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启示。

十多年来，结合在欧洲的旅行，个人陆陆续续读过许多欧洲通史和国别史，也涉略了不少欧洲城镇史、宗教史和文明史，这种交互式阅读带给人的快感，真的很难言说，以至即使困居书斋，似仍依稀看得到它们精彩的演出。由于自己看得认真，这种演出的细节也就不容易被忽视。相反，它们纤毫毕至地呈现在眼前。其逼真与丰富，任何部帙宏大的史书都不能穷尽，包括这部《欧洲史》。不过尽管如此，此书所揭示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教义和日耳曼蛮族文明的相互激荡，以及由这种激荡而生成的历史的种种变态与文明的颠沛互进，仍大有助于人了解欧洲的历史与文化，尤其是让个人的行走变得更扎实，更有历史感。

譬如，今天欧洲各地仍散落着不少中世纪古城。借助这部书，能使人对那里的街巷和市场生出别一重感念，并得以更准确地辨识其时商贸往来的景况。盖欧洲多高原与山地，地中海地区又高温干旱，生存的困难逼得人或海外征战立功，或异地经商求富，日久养成私产保护的自觉，所谓“并非万物悉归国王”，再衍生出入权至上的观念，都对今天的欧洲乃至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以后也因为财富渴求，甫从中世纪觉醒，就把目光投向东方。今天亚平宁半岛上的无数故事，都向人诉说着大航海时代的英雄史事，它所揭示的是海洋把人联系在一起的观念，有力地促进了其时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融通。而与重商主义相辅行的宗教的解放与民主自治的兴起，还有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的抬头，也终于随着海上霸权由西、葡向荷兰再向英国的转移，一起推动欧洲迅速超越亚洲，站上了早期资本主义的潮头。

这其中，征服永远是这一潮头的主旋律；在征服中汲取，永远是维护这一主旋律的不二法门，即使对东方的中国也



千年宰相 百年书香 岁月呼啸而过

■ 绿 茶

虽然已经三年没回老家，思乡心切，但这个春节还是留京度过，想给自己多一点休息。经过三年疫情，我们每个人都太需要休息了，对我来说，阅读是最好的休养生息。春节那几天，除了爬过一趟长城，滑过一次雪，其他时间都在读书。先后读了祝总斌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江澄波口述的《书船长载江南月》（古吴轩出版社出版）和杨苡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春节档最热的电影无疑是《满江红》，网上热议一片，一代奸相秦桧再次成为热门人物，说到宰相，我们自然就想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事实上，宰相从来不是一个官名，而是对于辅佐帝王治理国家最主要官吏的习惯称呼。不同朝代，可以称之为宰相的官吏并不相同。就说秦桧吧，他在宋高宗朝两度拜相，而他的真正官名是：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祝总斌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是对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研究的经典著作，考察研究了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宰相制度。大体来说，两汉时期，三公是宰相，三公也是一种称呼，不是官名。西汉朝的二公，就是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很多人可能把宰相和丞相等同了，丞相是宰相，但宰相不仅仅只有丞相，到了东汉，排位有所改变，太尉改

称大司马，成为三公之首，其次为司徒和司空。曹魏时期，三公仍是宰相。

但到了两晋时期，三公逐渐发展成“八公”，分别是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司徒和司空，八公基本属于虚职，授予年事已高的官吏和地方都督。而太尉、司徒和司空又有“三司”之称，仍视为宰相。但真正的宰相机构是尚书台，尚书令和左右仆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宰相。

到了南北朝时期，大体上都延续两晋，尚书台是真正的宰相机构，但又陆续发展出门下省、中书省等实权机构，成为隋唐三省制的基础。祝总斌这本书的研究跨度，从公元前202年西汉建立到公元581年隋朝建立，近800年历史，为我们详细分析和梳理了宰相制度的规则、变迁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明朝朱元璋废除宰相，延续了1000多年的宰相制度至此终结，但实质上的宰相制度则是随着清帝国终结才真正结束。说到晚清，苏州文学山房旧书店97岁的店主江澄波老先生的口述回忆录《书船长载江南月》就从光绪年间讲起。130年前，江澄波的爷爷江杏溪在苏州创办了文学山房旧书店，历经三代传承，如今已是书店传奇。江澄波老先生97岁高龄每天还守着书店，可谓是中国书店业最年长的“网红店主”，同时，江老也是古书业的“活化石”，对于近百年的中国书业史，了然于心，娓娓道来。

在江老的记忆中，那曾经繁华的古书业、曾经鲜活的藏书文化、曾经劳累的贩书日常，都生动而亲切，给今天的读者再现了百年来江南古旧书业风貌和旧书市场，还原了书林轶事和访书趣事，真实记录了郑振铎、顾廷龙、阿英等藏书家在动荡岁月保护文献典籍的义举。这本书不仅是一位书店老人对百年书店业的回顾，也是中国藏书文化在今天依然鲜活的明证。本书的整理者之一韦力先生，就是中国著名藏书家，他早年经常去苏州买古书，也跟着江老到访到很多珍贵的古书，他们几十年的交往，其实是两代古籍收藏家的精神交流。可以想象，他们在一起回味百年书业史时，内心是多么愉悦，又是多么无奈。

如今的古籍收藏，和百年前甚至几十年前已大不一样，而像江老这样走过近百年的人，他眼中的中国古书业，又是多么丰富多彩的画面，那些经手的、过眼的、错过的、卖过的古籍，如今大都天各一方，但只要还有人在买、在藏，在关心古书业，中国的藏书文化就会一直繁荣下去，而这本《书船长载江南月》就是最真实的记录，让我们看到藏书史的传承和延续。

春节期间，读了田晓菲的《赤壁之战：建安与三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其中关于“建安七子”的内容让我很感兴趣。田晓菲说，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列举了他认为当时最优秀的七位作者孔融、陈琳、王粲等，后来成为名传千古的“建安七子”，但有意思的是，曹丕写《典论·论文》的时候，七子都已过世，他们其实是被后世追认命名的。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范晔在《后汉书》中记载：“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曹丕后来在《与吴质书》中写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了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这些文字说得很清楚了，曹丕不是出于友情，痛惜七子的才华，把七子的作品编定结集，予以弘扬，从而创造了一个文学的经典案例。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曹丕对于七子的个人情感关怀。

“建安七子”之后，又有“竹林七贤”、王羲之及“兰亭雅集”，陶渊明、谢灵运等等，构成一个时代的人文风景。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曾高度评价魏晋风度，魏晋被誉为人的觉醒的时代。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宗白华说的：“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冯友兰称魏晋风度的核心是“深情”。在名教和自然的矛盾中，在情和礼的冲突中，魏晋人推重“自然”和“情”。

陶渊明被认为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孙康宜在《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中，称陶渊明“重新发扬诗歌的抒情传统”，陶渊明以个人的声音，复活了古代的抒情诗，宣告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哲理玄言诗模式的终结。陶渊明可以说引发了诗歌史上的第一次“情感转向”。

确实，人的本质是一个情感的存在，人作为情感的主体，其生命就是情感的活动，生生不息连绵相续的情动，直至死亡。因为疫情，当下也出现了“情感转向”，人们在疫情中发现了情感的重要性，亲情、友情、爱情等等，缓冲了危机，保护了人类。诗歌是情感的储存器，储存着人类的情感史和心灵史。人们可以通过诗歌，重新建立爱的联系，建构情感的共同体，建造心灵的保护区，重建爱的家园。

（作者为诗人、《诗刊》主编）

诗歌与『情感的转向』

■ 李少君

百年说长也长，但对104岁的杨苡先生来讲，她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传统的中国年还没过完，看到杨苡先生过世的消息，让人悲伤。在此之前，女儿赵蕾知道妈妈感染后特别担心，联络各方安排妈妈住院，每天通过南京的亲人了解妈妈的病情。阳过之后，赵蕾第一时间赶赴南京，陪护重病中的妈妈。然而，永远乐观、美丽的杨苡先生还是走了。春节假期最后一天，谈了杨苡先生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心情特别沉重，对这位乐观、单纯的老太太又多了一层了解。

杨苡先生以她一向的乐观和单纯，回忆了自己的青少女时代，交集过的那些人，既有师辈的像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陈梦家、吴宓等，也有同辈的杨宪益、巴金、李尧林、赵瑞麒、穆旦、巫宁坤、萧萧等，恰同学少年，那种情谊如今看来多么纯粹，多么真实。

百岁的杨苡，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里，更多兴趣在理书和翻看旧信旧物。一百年来，那些人，那些事，有说不完的话，回忆不完的情节。这本书自然也不能尽其所有所想，岁月呼啸而过。她一直在为离世做着各种准备，她从不讳言死亡，也从不失去盼望。她最喜欢引用《基督山恩仇记》里的结尾：“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当中：等候与盼望。”

（作者为诗人、作家）